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SHING FOUNDATION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

69

英语文学与圣经传统 大词典

(上)

[美]戴维·莱尔·杰弗里(谢大卫) 主编

中译本主编 刘光耀 章智源

A DICTIONARY OF BIBLICAL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



上海三联书店



英语文学与圣经传统 大词典

(上)

[美]戴维·莱尔·杰弗里(谢大卫) 主编

中译本主编 刘光耀 章智源



ADDITIONARY OF BIBLICAL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



“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

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基督教文化经典系列

主编 查常平

A Dictionary of Biblical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
©1992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总 序

陈 恒

自百余年前中国学术开始现代转型以来,我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历经几代学者不懈努力已取得了可观成就。学术翻译在其中功不可没,严复的开创之功自不必多说,民国时期译介的西方学术著作更大大促进了汉语学术的发展,有助于我国学人开眼看世界,知外域除坚船利器外尚有学问典章可资引进。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又开始了一轮至今势头不衰的引介国外学术著作之浪潮,这对中国知识界学术思想的积累和发展乃至对中国社会进步所起到的推动作用,可谓有目共睹。新一轮西学东渐的同时,中国学者在某些领域也进行了开创性研究,出版了不少重要的论著,发表了不少有价值的论文。借此如株苗之嫁接,已生成糅合东西学术精义的果实。我们有充分的理由企盼着,既有着自身深厚的民族传统为根基、呈现出鲜明的本土问题意识,又吸纳了国际学术界多方面成果的学术研究,将会日益滋长繁荣起来。

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降,西方学术界自身的转型也越来越改变了其传统的学术形态和研究方法,学术史、科学史、考古史、宗教史、性别史、哲学史、艺术史、人类学、语言学、社会学、民俗学等学科的研究日益繁荣。研究方法、手段、内容日新月异,这些领域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面貌,也极大地影响了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学术取向。不同学科的学者出于深化各自专业研究的需要,对其他学科知识的渴求也越来越迫切,以求能开阔视野,迸发出学术灵感、思想火花。近年来,我们与国外学术界的交往日渐增强,合格的学术翻译队伍也日益扩大,

同时我们也深信,学术垃圾的泛滥只是当今学术生产面相之一隅,高质量、原创作的学术著作也在当今的学术中坚和默坐书斋的读书种子中不断产生。然囿于种种原因,人文社会科学各学科的发展并不平衡,学术出版方面也有畸轻畸重的情形(比如国内还鲜有把国人在海外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论文系统地引介到学术界)。

有鉴于此,我们计划组织出版“上海三联人文经典书库”,将从译介西学成果、推出原创精品、整理已有典籍三方面展开。译介西学成果拟从西方近现代经典(自文艺复兴以来,但以二战前后的西学著作为主)、西方古代经典(文艺复兴前的西方原典)两方面着手;原创精品取“汉语思想系列”为范畴,不断向学术界推出汉语世界精品力作;整理已有典籍则以民国时期的翻译著作为主。现阶段我们拟从历史、考古、宗教、哲学、艺术等领域着手,在上述三个方面对学术宝库进行挖掘,从而为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作出一些贡献,以求为 21 世纪中国的学术大厦添一砖一瓦。

致中国读者

在这二十年里，我一直有幸作为一位友人和频繁的访问学者来到中国。我看到在学者中以及在文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学生中，对圣经的兴趣与日俱增。在我看来，中国大学生对圣经故事的熟悉度现在要超过欧洲和英联邦的大学生，在某些领域比得上甚至超过了典型的美国学生。这种教育的成就正在使得对英语和其他西方文学更加细致并具有说服力的互文性理解成为可能。如果不是这一教育成就，这种理解也不可能达到。而且，这种丰富性在目前中国文学学术研究中也是非常明显的。

因此，在我看来，《英语文学与圣经传统大词典》中译本的出版，既是中国比较文学研究成熟性的另一个证据；而且，经由刘光耀教授和他的学术翻译团队的出色工作，这又是对文学学者和学生持续的兴趣和需要的一种学术性认可。我的非常有才华的中国同行们能从事这样一个庞大、繁复而多语言的吃力的翻译任务，这是我巨大的荣誉。我深深地感谢他们，并感谢支持他们工作、将此译本付梓的人们。

无论是1976年我与来自加拿大、英国、欧洲、以色列和美国的同事们开始编纂《英语文学与圣经传统大词典》的时候，还是1992年它在Wm. B. Eerdmans出版的时候，我都没有想到这会成为我受邀到中国来的一个成果。自1994年起，我就在中国多所大学的校园里度过我最快乐的许多学术研究生生活，也受到中国的教授和学生们的智慧和成果的指导，我至今还把他们当成我最亲密的朋友。刘光耀教授本人参加

过 1994 年在燕京研究院(现位于北京联合大学的校园里)召开的“西方文学与基督教国际研讨会”,并对在过去的这么多年里一直没有消逝的这个主题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我真诚地感谢他,感谢所有的译者,感谢出版社,将这一共同协作的著作带给了中国读者。

加拿大皇家学会会员

美国贝勒大学文学和人文学科杰出教授

北京大学客座教授

戴维·莱尔·杰弗里(谢大卫)

鸣谢

如果没有大量不同方面的学者协作团队的参与,这本书是不可能的。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为《英语文学与圣经传统大辞典》作出贡献的两百余人当中,圣经研究主编协会和主编助理委员会中的每一位都对词条作了认真审查,并提出了编辑建议。他们的耐心、好意和锲而不舍是不断更新涌流的源泉,并且当我自己精力不支之际更是如此。这些贡献者十人十人一组,等待着他们劳动成果的最后呈现形式,非常和蔼礼貌地对在复杂而有技术难度的编辑过程中提出的修订建议予以支持,为这个词典的编织提供了每一针、每一线。

在进行规划的最初阶段,那时还在维真学院(Regent College)的W. W. 加斯克(Gasque)是一个热情的共同策划人。他无限相信这项工作的价值,为寻求其他许多的合作者出力甚丰。虽然健康状况不佳,塞缪尔·桑德默尔(Samuel Sandmel)对这项工程最早给予了珍贵的鼓励;其他的早期支持者还包括萨克文·伯科维克(Sacvan Bercovitch)、詹姆斯·里尼(James Reaney)、罗兰·马希特·弗赖(Roland Mushat Frye)、利奥·达姆洛斯克(Leo Damrosch)和皮埃尔·萨瓦德(Pierre Savard)。我要感谢渥太华大学,尤其是通过保罗·哈根(Paul Hagen)和马塞尔·哈梅森(Marcel Hamelin),在实际事务上对这项工作给予的各种支持;我还要感谢加拿大社会科学和人文研究委员会,她承担了

整整三年(1983 - 1986)的研究费用。

从许多优秀的研究生助手那里我得到了助益。那些在最后十二年的各种时间里为我在词典上工作的人当中,我特别要感谢加利·豪奇(Gary Hauch)、琳达·豪奇(Linda Hauch)、珍妮弗·布拉德肖(Jennifer Bradshaw)、马涅·帕森斯(Marnie Parsons)、托比·克里斯坦森(Tobi Christensen)和帕特里夏·森德兰(Patricia Sunderland)。他们中的每一位都心甘情愿地做了各种各样单调乏味得甚至令人头痛的工作,这使我对他们备感疚歉。来自许多方面的学者慷慨地在各种事情上给了我帮助:鲁思·迪安(Ruth Dean)、凯瑟琳·布朗·特卡兹(Catherine Brown Tkacz)和索尔·利普特津(Sol Liptzin)分承了参考文献部分。我所在系的同事中,卡姆·拉·博赛尔(Cam La Bossière)、约翰·希尔(John Hill)和多米尼克·曼加涅洛(Dominic Manganiello)总是意气风发地奋战到晚上十一点,帮助完成拖拉下来的词条的重担——对这种困难中的友谊我将永远感激不尽。

在这个庞大的工程中,主编和出版社的生产部门扮演着关键性角色。弥尔顿·埃森伯格(Milton Essenburg),尤其是查尔斯·范·霍夫(Charles Van Hof),以他们实际工作的激励与耐心和深思熟虑的劳动,证实了何为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这里仍残留下来的谷壳,并不是他们承担的部分因努力不够而没从我的打谷场上清除出去。

《英语文学与圣经传统大词典》编写了好多年——时间太长了,一些积极支持或参与其中的人竟未能在有生之年看到他们的劳动果实。在编辑顾问当中,F. F. 布鲁斯(Bluce)出力尤大;彼得·克雷吉(Peter Craigie)、J. G. 戴维斯(Davies)、约瑟夫·E. 邓肯(Joseph E. Duncan)赫伯特·吉尔斯布莱奇(Herbert Giesblecht)、戴维·格林伍德(David Greenwood)、科林·赫默(Colin Hemer)、萨拉·霍拉尔(Sarah Horrall)、马克·S. 马多夫(Mark S. Madoff)和约瑟夫·麦克拉奇(Joseph McClatchey)都是做出宝贵贡献的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未

能看到词典付梓面世。

塞缪尔·约翰逊博士(Dr Samuel Jonson)把辞典编纂者定义为“没有受到伤害的苦役犯”。几乎每一个从事这类工作的人,在某些地方都表现出了这种令人称奇的既苦又乐的心情。不过对于那些让生命经历这种体验的人来说,这个值得引用的说法会显得像是种自我欺哄。但说这是个欺哄是修辞性的,这本词典的编撰者不仅仅没受到伤害——尤其是那些对之极为喜爱和亲切的人,虽然他们本来可以用来过家庭生活的几千个小时被偷去了。我的妻子凯瑟琳(Katherine)在陪伴我的最后十年里,以她甚富天赋的(也是昂贵的)工作智慧,消除了本书中许多在她看来常常会令人羞愧的瑕疵。坦白地说,在许多方面,《英语文学与圣经传统大词典》的完成更应归功于她。对于我的两个小儿子,我深感多有亏欠。在他们所处的年龄有许多事尚无力单独应对时,我却因忙于大词典的编撰而疏于给他们应有的帮助和陪伴。

最后,这本辞典的出版意味着是对上述所有人的新的谢忱。对于他们我们是如此地感谢,我们愿将一切事情托付给他们,不仅仅我们有能力做的工作,而且还有推动我们去工作的爱。

戴维·莱尔·杰弗里(谢大卫)

1992年6月2日

于安大略省,斯宾塞村,红隼农场

英文版前言

理解圣经的某种东西,以及理解圣经“在”英语文学之中并“通过”它所进行的传布,也就是在英语文化意识最为丰富、表达得最为和谐一致的层面,对英语文化意识做出评估梳理。当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写下《上帝与圣经以及文学与信义》,尤其是当他紧紧抓住如何保守文化的丰富性及其同圣经传统的一致性这个 19 世纪末的“问题”,而同时却有某种使之从圣经宗教和圣经伦理的规约下脱离出去的倾向存在时,他对此是深有所知的。虽然备受称赞和效仿,但从阿诺德的世俗影响来看,在达到既定的目标这一点上他还是极大地失败了。不过与一个世纪以前相比,人们现在毕竟认识到了,对文学来说,在讲英语的世界里,没有什么文本能像圣经那样持续地发挥更大的塑形性的影响作用了。而且,与此相应,尤其是在 20 世纪下半叶,对于圣经叙事之理解的消退、淡化,已经在我们文学遗产中许多最伟大的世俗性文本中,造成了几乎难以解决的晦暗艰涩。与阿诺德能先于我们所做的相比,恢复圣经传统的需要现在也许更为迫切了。

这些因素促成了近一个时期以来对“作为”文学的圣经之批评兴趣的戏剧性增长。与此同时,毫不夸张地说,涌现出了数以百计的著作和论文,为现代读者正本清源地恢复圣经“在”文学之“中”的显而易见的角色进行了尝试。这些研究被传播开去并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攻

击,因为这些极有价值的研究往往是由专门性的文学学者仅仅就其文章和著作所关注的既定的文本所做出的。与此同时,全面性的有助于勾勒出对这种恢复所做的学术性和批评性努力的著作则几乎阙如,而它们对研究人员和其文化记忆仅仅由粗浅或破碎的圣经文学知识构成的一般严肃读者,却又总是不适用的。正是在这种语境下,《英语文学与圣经传统大词典》应运而生。它是为满足给这种已然蔚然可观且又正不断发展着的批判性的探讨领域,提供一般性参考文献这样一种明显需要而设计的。此外,本书还想为未来,尤其是未来更专业性的研究,提供一种本原性的指导。故本书就圣经在英语文学著作中诠释的历史及其在文学著作中的呈现,提供了一个内容丰富(但仍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基本的圣经研究参考文献。

本词典的一般计划可简略描述如下。

词条形式

每一个按字母排列的比较重要的词条在形式上都由三部分组成。它们有时由不止一个作者完成,但都经过了编者进一步的加工。词条描述了相应的词或短语在以下三方面是如何被理解和使用的:(一)圣经方面;(二)解经传统方面,包括犹太解经家、教会教父以及各个时期的解经作者,特别是其影响很好地建立起来的,如阿奇巴(Aqiba)、拉希(Rashi)、圣奥古斯丁(St. Augustine)、圣哲罗姆(St. Jerome)、圣伯纳德(St. Bernard)、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里拉的尼古拉斯(Nicholas of Lyra)、威克利夫(Wyclif)、路德(Luther)、加尔文(Calvin)、贝扎(Beza)、拉皮德(Lapide)、普尔(Poole)、亨利(Henry)等;以及(三)英语文学方面——一个基本的圣经在文学中之运用、变化按年代顺序排列的大纲。这里并不尝试提供一个详尽的具体参考目录,而只是通过典范性的例子刻画出文学从中世纪到20世纪的发展中富于意义的那些部分的踪迹。

这里的词条由六个普遍范畴而来。

一、圣经专有名词。如“巴别”(Babel)、“约伯”(Jacob)、“加百列”(Gabriel)。

二、普通名词。如“哈普”(Harp)。出现在本词典中的普通名词有如下几种类型:特殊圣经术语,如“玛门”(Mammon);在后来的传统中获得了图像性的弦外之意的日常名词,如“苹果”(Apple);由于同著名的圣经段落连在一起而具有特别寓意的词语,如“大磨石”(Millstone)。

三、概念。如“良心”(Conscience)。概念词并非总是圣经词语,它们只是偶然地来自解经和神学之表述的。如“三位一体”(Trinity)、“全知”(Omniscience)。当然,这种表述本身是已建立起来的圣经传统的一部分。

四、常见的引语或典故。如“不论断”(Judge Not)、“埃及的肉锅”(Fleshpots Of Egypt)。

五、寓言。如“浪子”(Prodigal Son)。对大多数耶稣寓言来说,都有以个人命名的词条,而旧约寓言则出自故事选段。

六、在希伯来文、希腊文和拉丁文中常见的词语中,以拉丁语形式出现的取自武加大译本的圣经文本,或礼拜仪式中对其所采用的内容。

本词典还包括许多简短的表明注释内容的词目,如取自《西都尔》和《塔木德》文学中使用十分普遍的术语,以及数百条指导读者对主要条目进行参校阅读的条例。

圣经翻译

由于《英王詹姆斯钦定译本》明显是文艺复兴以后大多数英语作者,甚至包括像劳伦斯(D. H. Lawrence)、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托尼·莫里森(Toni Morrison)和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等所喜欢的文本,除非另外注明,所有引用和涉及的英文圣经

均出自于此。其他版本,包括各种各样的现代版本和在历史上很重要的版本,有时会出于比较或说明的目的,或者文学典故涉及的版本明显不是钦定圣经译本,也会加以引用。对于中世纪文献尤其如此,就其而言武加大拉丁译本才是规范的。不过,对于《诗篇》而言,武加大译本顺序同《英王詹姆斯钦定译本》(英语范本)的相应章节也是契相合的,这便使中世纪和后宗教改革的文献得以融和一致起来。

解经文献参考书

在对犹太以及基督教的文献资源的引证中,实际上仍然有非常大的歧异,难能找到完美的一以贯之的规则。不过,读者将会发现明显的规范。这些包括:

一、希伯来文献的西班牙系而非德系犹太人的抄本。

二、盎格鲁—美洲的而非德语式大陆的章节和段落以及标题的区分形式,例如,是“Genesis Rabba”(主要《创世记》),而非“Bereshit Rabbah”(主要《创世记》)。

三、拉丁语标题和约定俗成的对教父和中世纪评注的章节区分的惯例(希腊语著作标题一般作了翻译)。

四、在实际运用上,像在加尔文(Calvin)的《托兰斯和托兰斯》(Torrance and Torrance)和《米德拉西》(Danby)的例子中,读者已被引导至以现代译文为标准,而不是起初语言的文本。

关于英语文学文本的参考注释

一般来说,读者可以假定,为诗歌和戏剧列出参考文献意味着接受约定俗成的编辑标准。散文虚构作品的编辑标准显得十分莫衷一是,而小说引证体例的差别歧异就更为严重了,以至在编排形式上所涉及的内容一般只以注出章序为限。

术语表和用法规则

这是一部聚焦于讲英语的世界的文学及与之紧密相关的释经传统的参考著作。与此相应,也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词条对没有特别宗教背景或兴趣的读者的功用,术语表是按照英语文化的标准规范地编制的。因此,参考文献指的是《旧约》,而不是像在别的语境中那样指的是希伯来圣经;日期的标准按的是 B. C. (公元前)和 A. D. (公元后)而不是 B. C. E 和 C. E。每一个词条都是用易于阅读的散文语言撰写的。引自于圣经、圣经注释和英语作者的文本,不论是引用的,还是翻译的,都未加改变而与其原文相一致。

参考文献

大多数较长的词条在其末尾都列有相关的参考文献。不过,书后三个详细的和注释性的文献包括的内容更广。它们是按照以下方式组织的。

一、圣经研究。

- (一) 给文学学者的圣经研究指导;
- (二) 一个精选的对作为文学之圣经的研究;
- (三) 关于英语圣经的简要翻译史。

二、圣经诠释史。

- (一) 对圣经解释的历史研究;
- (二) 对英语作者(分时期)有助益的圣经评注一览表;
- (三) 关于教父、中世纪和文艺复兴圣经评注的文献一览表。

三、英语文学中的圣经传统。

- (一) 圣经对英语文学的影响:挑选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 (二) 单个作家或一个作家群对圣经的运用。

圣经是一本没有其他图书与之相似的书。它不是转瞬即逝的男人、女人的话语,它只向将它作为启示、作为上帝之永恒话语的读者呈

示自己。然而,就像豪尔赫·路易·博尔赫斯(Jorge-Luis Borges)的一首诗所提醒我们的,它也宣布自己是“普通人”以必须承担的不可理喻的风险所可交托、委身的书(“Juan” 1, 14)。在超过三千年的时间里,人们就是以这些神圣的话语,有时清醒、有时愚蠢地进行“书写”,或者将之“读进”他们自己的生命的。尤其是作家们,一遍又一遍地逐字逐句在网线版圣经语词的字里行间推敲作注,默默地将他们自己的写作融进一个属人的作者所不敢以别的方式宣称自己也拥有的权威之中。认识到圣经是西方文学的基础,也就是部分承认在对文学特性典型的探索中的一个反讽。或隐或显地,作家们倾向于信赖个人的权威,信赖那种他们所分明不具有的权威。但正如博尔赫斯那样,我们也可看到,神圣权威本身在奇妙的共生性的信赖中坚持:只有当终有一死的读者以某种方式再一次将上帝之言作为他们可“交托”地接受,并一代代地每一次都用新的当时的语言使之更新时,上帝之言才会“对人写下的话语屈尊俯就”。

如果依赖不可靠的翻译,依赖“读进去”以及“读出来”,那么,每一代人对圣经的阅读状况都显然是悖论性的,我们对作为根基的圣经传统的重复都不可避免地是敷衍的和置身事外的。至少对世界上许多讲英语的人来说,圣经在一定意义上对于文化和文学是根基性的。但对四大洲许多使用非拼音语言的人来说,他们既学习自己书面语言的特质,也同时已经在用英语说和写了。所有发生的这一切至少首先可以使人接近一本毕竟是用希伯来语,然后用希腊语(一小部分是用阿拉姆语),接下来有若干世纪仅仅通过拉丁语的中介作用在西方为人所知的一本书。正像比德(Bede)关于凯德蒙(Caedmon)的著名故事所说的,这位文盲牛倌的“创造赞美诗”被作为有记载的最早的英语诗歌例子的证明,是指示性的。随着他新的圣经性的文化进入诗性的自由翻译,最早可确认的盎格鲁—撒克逊文学传统,便以《创世记》(Genesis)、《出埃及记》(Exodus)和《但以理书》(Daniel)这样的标题标示了出来。基涅

武甫(Cynewulf)对新约叙述的采用,促进了这个传统的典范化,并使该传统通过乔叟(Chaucer)、莎士比亚(Shakespeare)、弥尔顿(Milton)、班扬(Bunyan)和笛福(Defoe)而扩展开来,就像通过霍桑(Hawthorne)、麦尔维尔(Melville)、惠特曼(Whitman)和狄金森(Dickinson)向艾略特(Eliot)、奥登(Auden)、麦克利什(Macleish)和内梅罗夫(Nemerov)的发展一样。这样,对于圣经本身仍然是一本封闭的书,甚至是一本“死”书的英语文学的现代读者来说,除了别的因素,对圣经还是要坚持不懈地继续“听”的。文学对圣经的表现能否被令人信服地保存下来是成问题的,这个问题看来甚至也许是要看我们数量极为巨大的文学的物质性躯体,在书架上的保存期限可能有多久来决定了吧。

英语文学中的圣经传统参考文献

这个“英语文学中的圣经传统参考文献”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致力于圣经对于英语文学(即以英语写就的文学)——关于英语文学的一般情形和某些方面,如19世纪文学,美国文学——之影响的专著。一个典型的书名是:《现代文学中的圣经原型》(*Biblical Pattern in Modern Literature*)。第二部分是关于英语文学传统中一个或某个具体标明了的作家之影响的著作,其典型的书名是:《词的拼写:乔治·赫伯特与圣经》(*Spelling the Word: George Herbert and the Bible*)。第一和第二部分大体如此。在这里,书名如不是自明的,一般会提供一个简短的描述性的解释。

参考文献的第三部分是关于致力于文学对特别的圣经形象、人物或主题的运用的。一个典型的标题是:“伊丽莎白小说中的浪子”(“The Prodigal Son in Elizabethan Fiction”)。这种类型的文献内容是以缩略形式出现的,在本词典中所选的与相关词条相配的参考文献中可以找到。因此,这个引述的标题刚好就出现在词典中“PRODIGAL